

话题提出者、情境效应对夫妻互动行为的影响

琚晓燕¹, 方晓义², 李晓敏²

(1.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北京 100089; 2.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875)

【摘要】 目的:探索不同的话题提出者以及情境效应对夫妻互动行为的影响。**方法:**在实验室对 106 对新婚夫妻在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任务中的行为进行录像, 并采用爱荷华家庭互动编码体系 (IFIRS 中文版) 对行为编码。**结果:**①从总体上看, 妻子比丈夫有更多消极行为, 丈夫比妻子有更少的积极卷入行为。②丈夫在自己提出的问题解决话题中有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多的积极卷入; 而在对方的社会支持情境中有更多的积极情绪。妻子都是在对方的话题比在自己的话题中有更多积极情绪, 更多积极卷入行为。**结论:**夫妻互动模式受到话题提出人和情境的交互影响。

【关键词】 夫妻互动; 问题解决; 社会支持; 观察研究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6.02.032

The Effect of Topic Solicit Role and Context on Interactive Behavior of Couples

JU Xiao-yan¹, FANG Xiao-yi², LI Xiao-min²

¹School of Social Work, 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9, China;

²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main effect and interactive effect of topic solicit role and context on new couples' interaction behaviors. **Methods:** 106 newlywed couples were videoed when they discuss two problem solving and two social support topics in lab. IFIRS has been used to code couples' behaviors. **Results:** ①As a whole, wives had more negative behaviors than husbands, and husbands had less positive involvement than wives. ②For husbands, they had more positive emotions and more positive involvement when their own problem solving topic was discussed. For wives, they had more positive emotions and more positive involvement when their husbands' topics was discussed regardless of contexts. **Conclusion:** Topic context and topic solicit role have main and interactive effect on couples' interaction behaviors.

【Key words】 Couple interactive behavior; Problem solving; Social support; Observational study

夫妻互动模式一直是婚姻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众多家庭治疗流派, 如结构式家庭治疗、萨提亚家庭治疗都认为不良的夫妻互动模式是造成关系痛苦的重要原因。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 西方学者就开始用观察法对夫妻的互动行为进行细致研究, 并发现了丈夫和妻子在互动行为上的一些差异。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研究集中在对要求-回避沟通模式的探讨上。例如, 研究发现了夫妻沟通中妻子更多的是要求者 (即抱怨、责备) 而丈夫更多的是回避者, 并在不同的文化中得到支持^[1,2]。但也有研究发现, 在不同的情境下, 丈夫和妻子要求和回避的角色不尽相同。即夫妻双方都是在讨论自己提出的话题比讨论对方话题时更要求、指责^[3,4]。另一类研究集中探讨整个观察任务中, 丈夫和妻子谁的行为更积极, 谁的行为更消极。研究发现, 关于冲突话题的讨论大多由妻子发起^[5], 妻子的行为总体上要比丈夫更消极 (如批评、指责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只研究妻子提出的话题并不足够, 他们对丈夫和妻子提出的冲突话题同时研究发

现: 尽管在不同的话题中, 妻子都比丈夫消极, 但她们在讨论丈夫的话题时, 比在讨论自己的话题时消极行为更少^[6]。即夫妻在互动中的行为取决于他们是冲突的“申诉方”还是“受诉方”, 个体作为申诉方时的行为, 可能比自己作为受诉方时的行为更消极。但国内少有的观察研究发现, 无论是讨论丈夫的话题还是讨论妻子的话题, 妻子都比丈夫更消极^[7]。这是不是说中国的妻子总是抱怨者和指责者呢? 还需要加入更多的变量去证实。

综合以上这些研究, 发现有两个方面的不足: 一是探讨夫妻互动行为的维度过于单一。大部分研究只探讨了消极 (要求和回避都可视为消极行为) 和积极两个维度。在夫妻的现实互动中, 存在着大量的中性行为^[8]。这些中性行为虽然不带有强烈的消极或积极的感情色彩, 但却是夫妻互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容忽视。第二个不足: 大部分研究聚焦于夫妻的冲突解决行为, 而忽视了夫妻生活中的一些积极情境, 例如夫妻双方为对方提供支持等情境。有研究指出, 女性在提供支持方面的能力优于男性, 因为她们的共情能力更强^[9]。因此需要把这些积极情境纳入研究视野, 才能更全面揭示夫妻互动行为模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5BSH092)

通讯作者: 方晓义, E-mail: fangxy@bnu.edu.cn

式。如果能够进行多维度、多情境的研究,探讨性别、话题提出人、情境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夫妻多维度行为的影响,更全面的揭示夫妻互动行为的特点,将能对夫妻互动行为的变异进行更科学的解释。

针对以上不足,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观察研究,在同一个实验中同时进行两种情境的任务,即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在每种任务中,都由夫妻双方各自提出自己想要讨论的话题,并对夫妻的互动行为进行细致编码,探索性别(丈夫/妻子)、话题提出者(丈夫提出的话题/妻子提出的话题)与情境(问题解决情境/社会支持情境)三者对多维度行为(积极情绪、消极行为、积极卷入)的交互影响,对夫妻互动行为的变异提供更客观、科学的解释。本研究选取婚龄3年内没有小孩的新婚夫妻为研究对象,主要是避免其他因素(如:子女教育、原生家庭卷入)对夫妻互动模式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被试为结婚三年内没有小孩的夫妻106对,夫妻双方均为初婚的北京地区夫妻。研究人员通过网络发布招募广告,对感兴趣的夫妻进行资格访谈,并告知整个实验过程。确认夫妻符合条件并愿意参与后,与夫妻预约时间,到研究者的实验室参与研究。被试的基本人口学变量如表1。

从婚龄来看,结婚一年内的59对,占55.7%,结婚两年内的24对,占23.1%,结婚三年内的23对,占20.2%。丈夫的学历情况:高中学历的占1.9%,大专学历的占11.3%,本科学历的占36.8%,研究生及其以上的占50%。妻子的学历情况:初中学历的占0.9%,高中学历的占2.8%,大专学历的占4.7%,本科学历的占36.8%,研究生及其以上的占52.8%。从表中可以看出,丈夫和妻子的受教育年限没有差别,年龄和月收入丈夫显著大于妻子。

表1 被试基本人口学变量描述统计

	丈夫(N=106)			妻子(N=106)			t
	M	SD	范围	M	SD	范围	
年龄	29.62	3.37	23-43	28.00	2.26	22-36	5.641***
婚龄(月)	15.13	11.203	1-36	15.13	11.203	1-36	—
受教育年限	17.24	1.95	12-19	17.34	2.01	9-19	-0.525
月收入(千元)	10.22	7.66	2-50	6.61	47.26	0-30	5.648***

注: * $P<0.05$, ** $P<0.01$, *** $P<0.001$,下同。

1.2 研究程序

观察研究参考 Gottman^[10]、Pasch 和 Bradbury^[11]的实施程序。接受过培训的主试引领被试在本实验

室完成实验。先签署知情同意书,强调保密原则。然后进行“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两个任务的谈话;谈话过程被录制。实验先进行问题解决任务,再进行社会支持任务,以避免被试带着消极情绪结束实验。在每个任务中,夫妻各自选择一个话题讨论10分钟,顺序随机。在“问题解决”任务中,要求夫妻双方各选一个自己认为婚姻中需要解决的冲突,尽量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在“社会支持”任务中,要求夫妻双方各选一个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对自己不满意想要改变和提升的方面来讨论,且这个方面没有引发过夫妻冲突(为了和问题解决情境相斥)。要求夫妻以平常的方式对对方进行回应。实验结束后夫妻获得150元的报酬作为回报。

在问题解决互动中,丈夫所选话题排前三位的是“生活习惯”、“脾气及行为方式”、“沟通与情感表达”,分别占总数的20.75%、11.32%、11.32%;妻子所选话题排前三位的是“家庭财务”、“沟通与情感表达”、“脾气及行为方式”,分别占总数的16.98%、15.09%、13.21%。在社会支持互动中,丈夫所选话题排前三位的是“外表和生活习惯”、“工作”、“对人的态度”,分别占总数的27.36%、27.36%、16.04%;妻子所选话题排前三位的是“工作”、“脾气和性情”、“学习与深造”,分别占总数的24.53%、18.87%、18.87%。

1.3 研究工具

采用互动行为编码,由4名心理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的编码小组对夫妻的录像材料进行编码。编码体系采用中文版的Iowa Family Interaction Rating Scales (IFIRS)^[8],对夫妻互动中出现的13种行为进行编码。在编码工作正式开始之前,编码人员参加了每周10小时(包括2小时的手册阅读,4小时的培训讲解,4小时的课后练习)、历时3个月的培训,并在最终标准录像测试中达到78%的正确率。编码工作开始之后,4名编码人员每天参加一次两小时的编码一致性培训,以减少编码偏差,确保准确性。

编码人员对每个互动任务观看2-3次,记录被编码者在互动过程中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最后综合各行为出现的频率和强度从“1”(没有出现)到“9”(行为出现的频率和强度都很高)给予评分。13种行为聚为三个因素,积极情绪、消极行为和积极卷入。积极情绪包含了肢体情感、温暖支持、幽默玩笑3种行为。这三种行为的共同特点是互动者通过肢体动作或言语行为表达温暖支持等强度较高的积极情绪;消极行为包含敌意、质问、控制、否认、抱怨、心理攻击6种行为。这些行为的共同特点是:互动者

的言语和非言语内容都非常消极,他们通过质问、指责、抱怨、讽刺等行为表达对对方的不满等消极情绪和行为;积极卷入包含了有效沟通、倾听反应、回避(反向计分)、问题解决4种行为,这个维度表示互动者能够倾听对方、中立或积极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积极卷入谈话解决问题。

为评估编码的一致性信度,编码人员对前20%的录像进行独立的二次编码。如果两人的编码分数不一致,进行协商修正以得到最终的一致分数(如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报送小组讨论,确定最终标准),

用作正式数据。在编码一致性达到统计学标准后再对剩余的录像进行编码(录像随机分配给4位编码人员)。对于不同编码者评分一致性的评估,一般采用ICC作为指标(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简称ICC)^[12]。本研究中每个互动中丈夫和妻子在各个因子上的ICC在0.75-0.94之间之间,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1.4 数据整理和分析

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

表2 IFIRS中文版各因子编码者一致性信度(ICC)

	HPS			WPS			HSS			WSS		
	积极情绪	消极行为	积极卷入	积极情绪	消极行为	积极卷入	积极情绪	消极行为	积极卷入	积极情绪	消极行为	积极卷入
丈夫	0.87	0.94	0.81	0.75	0.89	0.80	0.79	0.88	0.91	0.76	0.81	0.89
妻子	0.81	0.84	0.70	0.90	0.91	0.75	0.79	0.92	0.88	0.86	0.87	0.88

注:H代表丈夫,W代表妻子;PS代表问题解决互动,SS代表社会支持互动,下同。

2 结 果

2.1 夫妻互动行为的描述统计及差异分析

2.1.1 丈夫和妻子互动行为的描述统计及夫妻间差异分析 首先对丈夫和妻子在四个互动中各因子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夫妻差异分析,结果见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妻子在4个互动中的消极行为均高于丈夫的消极行为($P_s<0.05$)。在妻子问题解决和丈夫社会支持话题中,妻子的积极卷入均大于丈夫($P_s<0.01$)。妻子的积极情绪只在丈夫的社会支持话题中高于丈夫($P<0.001$),其他互动中无显著差异。

表3 丈夫和妻子在四个互动中各因子的描述性统计

		丈夫		妻子		t
		M	SD	M	SD	
HPS	积极情绪	2.70	1.29	2.67	1.28	0.215
	消极行为	2.39	1.11	2.74	1.35	-3.236**
	积极卷入	4.79	1.09	4.77	1.21	0.256
WPS	积极情绪	2.50	1.24	2.58	1.34	-0.757
	消极行为	2.36	1.04	2.95	1.34	-4.968***
	积极卷入	4.52	1.14	4.88	1.07	-2.991**
HSS	积极情绪	1.07	1.25	2.91	1.29	-4.715***
	消极行为	1.77	0.60	2.05	1.29	-3.655***
	积极卷入	4.93	1.00	5.31	1.02	-4.216***
WSS	积极情绪	2.72	1.20	2.54	1.26	1.396
	消极行为	1.84	0.78	2.01	1.02	-2.212*
	积极卷入	4.96	1.12	4.98	1.02	-0.21

2.1.2 性别、话题提出人、情境对互动行为的交互影响分析 为了探索情境(2个水平: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话题提出者(2个水平:丈夫和妻子)、性别

(2个水平:男和女)对行为的影响,以性别为组间变量,话题提出人和情境为重复测量变量,做 $2\times 2\times 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各行为的方差分析结果如下。

对于积极情绪的变异来说,话题提出者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6.195, P<0.05$)。具体来看,丈夫在妻子提出的话题中($M=2.61, SE=0.103$)比自己的话题中($M=2.54, SE=0.108$)有更多的积极情绪,而妻子在丈夫提出的话题中($M=2.79, SE=0.103$)比自己的话题中($M=2.56, SE=0.108$)有更多的积极情绪。即双方都是在对方的话题中比在自己的话题中有更多的积极情绪。情境、话题人和性别的三维交互作用显著($F=12.905, P<0.001$)(见图1)。具体来看,丈夫在问题解决时,在自己的话题中($M=2.70, SE=0.125$)比对方的话题中($M=2.50, SE=0.126$)更积极;在社会支持时,在对方的话题中($M=2.73, SE=0.119$)比自己的话题中($M=2.39, SE=0.123$)更积极;对于妻子来说,无论是问题解决还是社会支持互动,都是在对方话题中(问题解决: $M=2.67, SE=0.125$;社会支持: $M=2.91, SE=0.123$)比在自己的话题中(问题解决: $M=2.56, SE=0.126$;社会支持: $M=2.54, SE=0.119$)更积极。

对于消极行为的变异来说,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9.29, P<0.01$)。具体来看,妻子($M=2.44, SE=0.081$)比丈夫($M=2.09, SE=0.081$)有更多的消极行为;情境的主效应显著($F=125.07, P<0.001$),互动者在问题解决情境下($M=2.61, SE=0.077$)比社会支持情境下($M=1.92, SE=0.051$)有更多的消极行为;情境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4.14, P<0.05$)(见图2),

具体来看,丈夫和妻子都是在问题解决中(丈夫 $M=2.37$, $SE=0.108$; 妻子 $M=2.85$, $SE=0.108$)比在社会支持中(丈夫 $M=1.81$, $SE=0.072$; 妻子 $M=2.04$, $SE=0.072$)有更多的消极行为,但妻子在两种情境中消极行为的差异要比丈夫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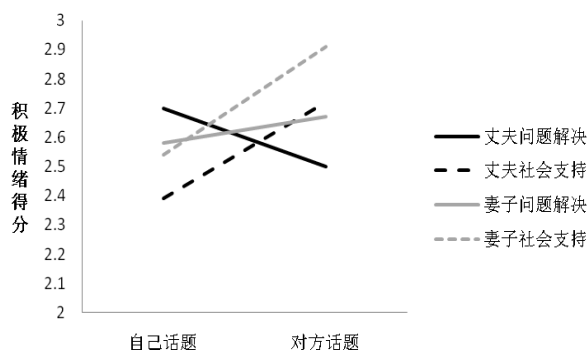


图1 话题提出人、性别与情境对积极情绪的交互作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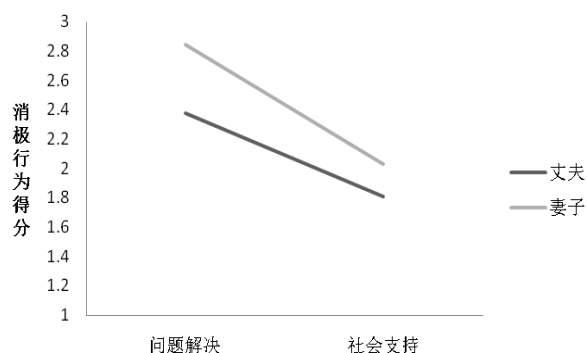


图2 情境与性别对消极行为的交互作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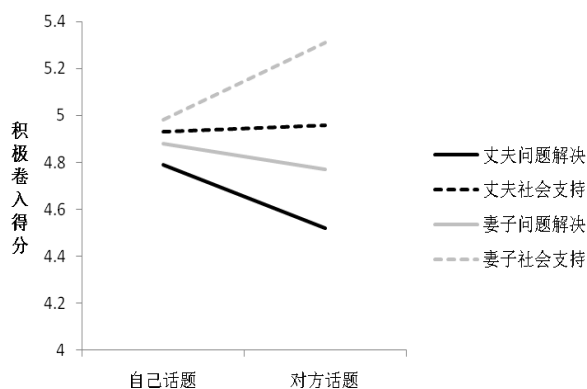


图3 情境、性别、话题提出者对积极卷入行为的交互作用图

对于积极卷入的变异来说,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2.16$, $P<0.05$)。具体来看,妻子($M=4.99$, $SE=0.087$)比丈夫($M=4.80$, $SE=0.087$)有更多的积极卷入。情境的主效应显著($F=29.49$, $P<0.001$),互动者在社会支持时($M=5.05$, $SE=0.065$)比在问题解决时

($M=4.74$, $SE=0.070$)有更多的积极卷入。情境、性别、话题提出人的交互作用显著($F=20.75$, $P<0.001$) (见图3):对于丈夫来说,在自己的问题解决话题中($M=4.80$, $SE=0.112$)比在对方话题中($M=4.53$, $SE=0.107$)有更多的积极卷入;在社会支持情境下,没有话题提出人的差异;对于妻子来说,在问题解决情境时,积极卷入在两个人的话题中没有差异,而在社会支持情境下,妻子在对方的话题中($M=5.31$, $SE=0.099$)比在自己的话题中($M=4.98$, $SE=0.104$)有更多的积极卷入。

3 讨 论

3.1 关于妻子的互动模式:仅仅是要求、指责吗?

以前的研究从总体上支持了妻子比丈夫有更多的消极行为,妻子比丈夫更多指责、要求行为^[1,5,7]。然而,在本研究中,当我们关注妻子的积极情绪和积极卷入行为时会发现,虽然妻子比丈夫有更多的消极行为,但妻子也比丈夫有更多的积极卷入行为,特别是妻子无论是在问题解决还是社会支持互动中,都是在对方的话题中比在自己的话题中更多的积极情绪。也就是说,妻子在互动中一边抱怨、指责、质问;一边积极的卷入谈话,尽力倾听、沟通,提出问题解决方;特别是在对方的话题中,还能够以自己的方式鼓励、支持、安慰对方,以使谈话更加轻松温暖。

这个研究结果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另外的一面,在夫妻的互动中,除了指责、抱怨、要求外,她们也在积极的想办法,配合对方解决问题,特别是在丈夫的“社会支持”话题中,妻子的积极卷入水平最高。

3.2 关于丈夫的互动特点:仅仅是回避吗?

尽管从总体上看,丈夫比妻子有更少的积极卷入行为。但是,我们也看到,当讨论妻子想要解决的一个冲突时(大多数是要求丈夫改变),男性表现出一定的回避行为,当讨论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也能够积极卷入,特别是在对方最需要支持和安慰的“社会支持”情境中,丈夫能够以自己的方式鼓励、支持、安慰对方。本研究没有支持之前认为的女性共情能力更好,更能安慰对方的结论^[9],反而是丈夫在妻子的社会支持话题中的积极情绪更多。

3.3 关于夫妻互动特点的差异

妻子无论是在问题解决还是在社会支持互动中,都是在对方的话题中,比在自己的话题中有更多积极情绪;而相反的是,丈夫是在自己的问题解决话题中比在对方的话题中有更多积极情绪,更多积极卷入行为;在社会支持互动中,与妻子的模式一致,

即在对方的话题中有更多的积极情绪。可以看出,丈夫的互动模式对于情境的变化比较敏感,而妻子的互动模式对于情境的变化不敏感。

本研究一方面发现妻子在谈话过程中确实比丈夫更指责、敌意、具有攻击性。可能的解释有两种,一是性别角色差异说^[13],即由于性别角色社会化不同,女性更多在关系中获得价值,担心被拒绝和抛弃,对对方的敌意其实是这种恐惧感的投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社会结构差异说,女性在家庭中参与了更多的家庭事务,遇到的问题更多,在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就会有更多的指责。

而同时本研究还发现了互动模式的话题提出人效应和情境效应。因此,我们提出互动模式的“情境影响说”。即夫妻的互动模式受到其是申诉方还是受诉方,是问题解决情境还是社会支持情境的影响,特别是丈夫,在讨论自己想要对方改变的话题时,丈夫能更积极的卷入谈话;在妻子比较脆弱,需要支持时,也能够积极卷入谈话并提供情感支持。而妻子都是在对方提出的话题中有更多积极情绪,更多的卷入。

参 考 文 献

- Christensen A, Eldridge K, Catta Preta AB, et al. Cross cultural consistency of the demand/withdraw interaction pattern in coup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6, 68(4): 1029-1044
- 琚晓燕,方晓义,戴丽琼,等. 澳门和东北地区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满意度研究.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2, 10(2): 131-137
- Christensen A, Heavey C. Gender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demand/withdraw pattern of marital confli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0, 59(1): 73-81
- Baucom BR, McFarland PT, Christensen A. Gender, topic, and time in observed demand-withdraw interaction in cross-and same-sex coupl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0, 24(3): 233-242
- Ball FJ, Cowan P, Cowan CP. Who's got the power?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tners' perceptions of influence during marital problem-solving discussions. *Family Process*, 1995, 34(3): 303-321
- Heyman RE, Hunt-Martorano AN, Malik J, et al. Desired change in couples: Gender differences and effects o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09, 23(4): 474-484
- 琚晓燕,谢庆红,曹洪健,等. 夫妻互动行为差异及其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基于一项观察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5): 790-794
- 琚晓燕. 城市新婚夫妻互动行为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2013
- Xu Y, Burleson BR. Effects of sex, culture, and support type on perceptions of spousal social support: An assessment of the "support gap" hypothesis in early marriage.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1, 27(4): 535-566
- Gottman JM. *Marital interactio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 Pasch LA, Bradbury TN. Social support, conflic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al dysfunc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8, 66(2): 219-230
- McGraw KO, Wong SP. Forming inference about som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Psychological Methods*, 1996, 1(1): 30-46
- Napier AY. The rejection-intrusion pattern: A central family dynamic.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Counseling*, 1978, 4: 5-12
- (收稿日期:2015-09-09)
- (上接第358页)
- Chen CY, Yen CH, Frank CT. Job crafting and job engagement: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son-job fi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4, 37: 21-28
- 盛建森. 教师工作投入: 结构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6, 2: 108-112
- Petrou P, Demerouti E, Peeters MCW, et al. Crafting a job on a daily basis: Contextual correlates and the link to work engagement.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doi: 10.1002/job.1783, 2012
- 齐亚静,伍新春. 影响灾区教师职业倦怠和工作投入的工作特征因素: 跨时间的比较.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2): 301-305
- 孟宁宁. 初中教师工作投入、组织公民行为对绩效的影响.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 刘伟,史占彪,张贤峰,等. 精神科临床医护人员工作特征,工作投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2): 315-318
- 王益宝,徐婷. 员工幸福感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经济论坛*, 2011, 497(12): 198-200
- (美)简·卢文格(Jane Loevinger)著. 韦子木译. 自我的发展.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 何显富,蒲云,薛英. 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员工组织认同感和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2(5): 61-67
- 李敏. 中学教师工作投入与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关系研究. *教师教育研究*, 2014, 26(2): 43-49
- (收稿日期:2015-09-18)